大众日报 DAZHONG

齐鲁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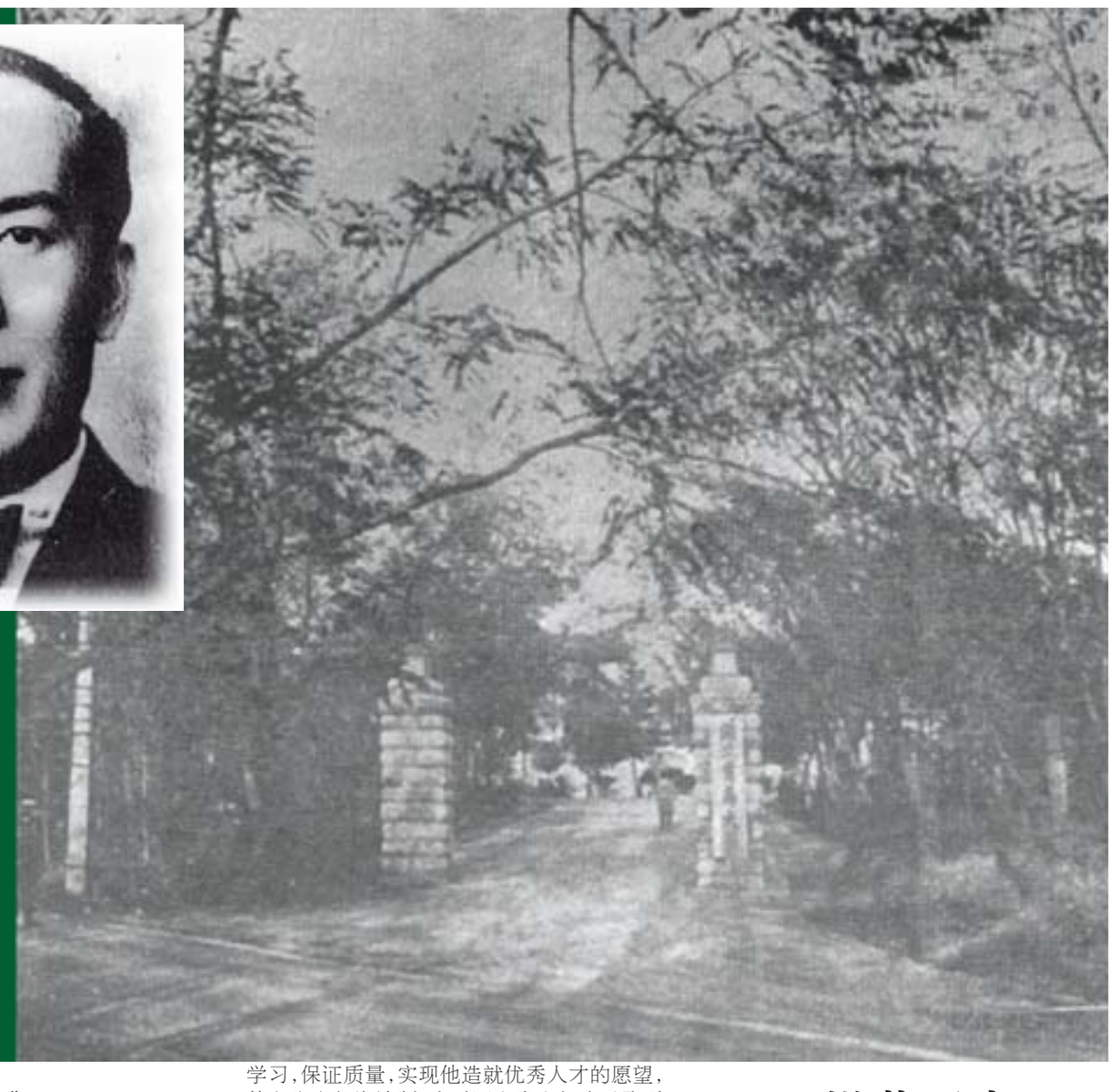
热线电话：(0531)85193379　Email：yaq@dzwww.com

83年前，山东大学青岛复建

□　李彦英

2011年8月16日，山东大学与青岛市人民政府共建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协议签字仪式在济南山东大厦青岛厅举行。这个协议的签订，对即将迎来110周年华诞的山东大学有着特殊的意义。从1928年国立青岛大学的创立，到1958年山东大学迁到济南，山东大学用30年的时间在青岛创造了海洋学科远东第一、生物学科全国最好、文史见长三大美誉。

青岛校区的启动，将山大人的思绪带到了80多年前的国立青岛大学时期。



上：杨振声
右：国立青岛大学校门

省立山东大学+私立青岛大学

1928年5月3日，日军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混乱局面中，省立山东大学师生大多散逸，学校陷入停顿状态。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决定在已停办的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指令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太侔、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11人为筹备委员，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负责筹建工作。但由于当时济南和胶济线均被日军侵占，一切筹备工作只能纸上谈兵，不能具体进行。

次年夏天，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携眷来到青岛，住原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平房宿舍内。他对青岛的优美环境，宜人的气候倍加赞赏。鉴于当时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济南是四省通衢，乃兵家必争之地，而青岛地处东海之滨，战乱较少波及，所以他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筹办。他多次称：“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重大。”

国民政府教育部尊重这位资深教育家的意见。于是，1929年6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第26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筹建国立青岛大学的议案，其议案内容如下：

“教蒋部长(梦麟)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经费，因事实上困难，一切尚待规划，查该省青岛地方，有私立青岛大学一所，为张宗昌逆党前省议会议长宋传典所办，自胶济经中央接收，该校长早离校他往，现校中状况纷乱，自不待言。且该校向无确定基金，全赖鲁省款及青岛市款补助。拟将该校取消，其校产归山东大学收用，国立山东大学名称，拟改为国立青岛大学。查青岛交通便利，环境优胜，设立大学，自较济南为宜，可否敬候公决案。决案：照办。”从此，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即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校产外，在青岛接收私立青岛大学的校址、校产。

“难产”的校长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国立青岛大学一直未能正式开学，仅在1929年下半年，刊登过启事，招收新生补习班。而阻碍大学及时开办的主要原因便是接收私立青岛大学和省立山东大学校产、办学经费问题。

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人选也迟迟未定。筹建之初，即有何思源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之说，并见诸报章。由于何思源既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又是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出任校长亦属顺理成章。但后来没有下文。到了8月中旬，也就是蔡元培委托吴稚晖催促国立青岛大学经费后不久，又从南京传出消息：“教部决任吴稚晖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并已得吴同意。”但最终还是没有结果。直到1930年4月，才确定由山东蓬莱人杨振声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一职。

1930年4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5月，杨振声到校视事，着手聘请教师、争取经费和安置原有学生等工作，国立青岛大学的筹建工作开始走上正轨。随着经费、教师诸事的逐渐落实，国立青岛大学招生工作也全面展开。

1930年7月，国立青岛大学在《申报》等报纸连续刊载招生广告，于8月分别在青岛、济南招收了第一年级新生153人。9月21日，在青岛原俾斯麦兵营举行国立青岛大学开学典礼，校长杨振声宣誓就职，杨振声校长在会上作了《打基础、重质量、务实际、艰苦创业》的讲话，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

“先尝后买”，名流云集

杨振声校长到任后，效法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治学方法，力推“兼容并包，民主科学”的思想，积极延聘国内专家、学者来校任教，曾一度亲自赴沪采取“先尝后买”的方针，约请闻一多、梁实秋等大家来青。他对闻一多和梁实秋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由于青岛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加之“今甫(即杨振声)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抗拒的力量”(梁实秋语)，所以，先后聘得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作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梁实秋任英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育家黄敬思任教育系主任兼教育学院院长，数学家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化学家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之任生物系主任，庄德寿任物理系主任。文学院还有教授赵畸、杜光埙、谭葆慎、程乃颐、马师儒、郭斌龢、宋春舫(兼)，讲师游国恩、赵少侯、沈从文、黄淬伯、方令孺、薛彩凤、李方琮、梁启勋及教员、助教30余人。理学院还有教授傅鹰、周钟歧、王恒守，讲师王普、郭贻诚、李先正、梁其奎、宋智斋、秦素美、沙凤护等及教员、助教共40余人。另有体育教授郝更生、宋君复、高梓等3人。一时之间，名流云集，英华蕴聚，学术空气浓厚，学校声誉日隆，教学科研蒸蒸日上，形成国立青岛大学创建后第一个鼎盛时期。

从严治校，特色彰显

杨振声主张从严治校，主持制定了完备的规章制度，使学校工作能按部就班有序进行，进而形成优良的校风，造就有用之才。杨振声尤其重视办学质量，在他离开北平赴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时，傅斯年先生曾经对他说：“只要你能领导两三个学生走上学问的正路，也便不虚一行了。”他对此言深有同感，为了促使学生勤奋学习，保证质量，实现他造就优秀人才的愿望，他主张实行淘汰制。当时国立青大招生录取采取“严进严出”的方式。学生首先必须通过标准极高的入学考试，其次必须经过新生委员会的筛选，防止作弊入选。学生学习和生活均受学校严格管理。对于课业，学校规定：一学期中，缺课1/3或旷课满5小时者，不得参加该课程考试；如果全年所选修课程有1/2或3门不及格，责令退学；有1/3或2门不及格，留级一年，但不得超过两次；考试有大考和小考之分。由于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得国立青岛大学在创办后的短短几年里，被公认为近代教育史上山东唯一达到高标准，可以和国内名校并驾齐驱的高等学府。

在青岛任职期间，杨振声还对本地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古迹文献等作了认真的考察分析，提出了颇具远见的办学规划，力倡开办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他主张：“……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大。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如此，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杨振声的这番真知灼见，为中国的海洋科学作出了贡献，在他首创之下，国立青岛大学乃至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之后，海洋科学始终是独步国内，以至在“山大”基础上建立了青岛海洋大学(后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至青岛发展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1932年，杨振声因学生运动和教育部拖欠办学经费多次提出辞呈。这年9月，南京政府决定照准杨振声校长辞职，并将国立青岛大学改称国立山东大学。

撙节开支 勤俭办学

国立青岛大学在建校之初，经费严重不足，不仅没有开办费，经常经费也仅40余万元，只等于同时期的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可以说除了校舍，其余一切几乎均须从头做起。在这种情况下，杨振声从实际出发，提出撙节开支、勤俭办学的方针，把节省下来经费用于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及增加建筑方面。杨振声以身作则，学校为了办公方便，要给他买一辆汽车，他坚持买了一辆旧的老式汽车，始终没有换。他一向公私分明，即便是一个信封、一张信纸，从不用公家的东西。但是在学校的校务会上，杨振声则带去自己家里的香烟、咖啡和茶叶，与大家一起分享。

为节省经费，杨振声将学校分给他的宽大的校长住所让给其他教授住，认为可以多住几家，以此缓解教授的居住问题，他则自费租房。他租住的两层楼房，让邓仲存、赵太侔等人免费居住。梁实秋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应为黄县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

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教学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位于黄县路7号杨振声的住处喝茶谈诗，煮酒论文。经常手中拿着一个大烟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杨振声豪于酒，他和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等人被人称为“酒中八仙”，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

■　尺书闲话

好领导宋江

□　彭思信

在宋朝那种冷兵器时代，一身武艺便是一个人能力的象征，梁山好汉们几乎每个人都是武艺高强，要想把这么一帮人团结起来并领导他们，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江偏偏做到了，作为土匪窝里的一介领袖，宋江当之无愧。

宋江能领导梁山，并非他有武艺，而是因为他有一大套领导草莽英雄的方法。王伦作为第一代领导人，没有本事不要紧，还目光短浅，嫉贤妒能，无法团结众多好汉，结果被有本事的林冲给火拼了。第二代领导人晁盖，虽说有些本事，也算仗义疏财，却也属一介武夫，做朋友打打杀杀可以，领导一群草莽英雄却有些勉为其难了。宋江自幼便很懂得为人处世，又善于包装自己，“忠孝”便是他凶恶之后的遮羞布，又喜欢仗义疏财，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宋江的真本事，还是他读人用人的功夫，这本事在梁山众好汉里面，他独一无二。

正因为宋江自知没有多大的本领，他便没有居高临下的臭架子，对那些有用之人，他总有一张慈祥的笑脸，有长者风度。对武松李逵这种难以驾驭的人，他能动用真感情，让人感觉到长者关怀的同时，也利用他们的地位抬高了自己的身份，就连王英这样的好色之徒，为了能利用他，想方设法给他配上个老婆，所以说，他对手下人考虑得挺周到，事无巨细，使“细节决定成败”；即使对待俘虏，像呼延灼、秦明、董平、徐宁等好汉，他也是“亲解其缚，好言相劝”，使其感恩戴德，归顺梁山，而对卢俊义、关胜，知道他们是硬汉，再用那套“亲解其缚，好言相劝”就不好使了，便演出了段让位的假戏，这种“忠义”终于打动了他们；然而，对待自己真正的敌人，却也是凶残至极，毫不留情，像黄文炳、史文恭，必置其于死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风格，梁山上任何一个好汉都做不到。

除此之外，宋江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懂得如何跟人友好相处，能容人，团结人，能根据人的性格特点做思想工作，使一切不利于团结的事都消亡在萌芽之中。在这一点上，晁盖便稍逊一筹。再者，宋江演技好，是个极会表演的演讲家，他口才好，能言善辩，极好地利用这个优势团结多数人。虽说吴用口才好，有心机，知人善任，可吴用在捉摸人上，还是离宋江差了一大截子。

宋江还有一项绝活，那就是“有困难找宋江”，是一个活脱脱的活“雷锋”，所以，江湖上他名气非常大，因了这个名气，他才能做梁山之主。而他以身作则，遵纪守法，又给梁山好汉们做出榜样，就只有这一点上，宋江不像草莽，他大概明白“自己不正难以正人”的道理。作为一个草莽领袖，为了自己的一点私欲，就采用杀人的方法来自我满足，从这一点看，宋江做人是失败的；可能领导一群土匪，能做到这一点，也属难能可贵吧。

■　群贤毕至

红顶风水大师

□　李金科

在清代历史上，高级官员以谙熟风水学说而被帝王宠幸者，莫过于雍正年间的名臣高其倬。他也因精通堪舆术被时人称为“红顶风水大师”。

作为雍正帝的宠臣，高其倬屡被委以重任，历任云贵总督、浙闽总督、福建总督、两江总督、云贵广西总督、江苏巡抚等职，并赏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雍正对其甚为倚重，称他为“名臣第一”，对其多有赏赐。雍正得知高其倬精通堪舆之学，每有堪舆方面的大事辄命其前往相度。雍正四年四月，雍正命时任福建总督的高其倬来京，相度修缮福陵。雍正八年又命高其倬随怡亲王允祥为自己选择陵址。按照先例，雍正的陵寝应该在河北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与父祖葬在一起，雍正也曾想把东陵内的九凤朝阳山作为自己的墓地，但经堪舆之人看后，认为此地“规模虽大，而形局不全，穴中又多沙石，实不可用”。所以高其倬与允祥四处为雍正寻找吉地，他们来到易县城西永宁山下的太平峪，看到这里山清水秀，风水极佳，遂上奏折，称此地是“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沙石无美不收，山脉水法调理详明，形势理气诸吉咸备，洵为上吉之壤”。雍正阅折后，认为此地与东陵相据数百里，恐不太合适，命群臣商议。大臣们查阅史料，列举汉唐以来帝王远离祖先另辟陵区的事实，认为易县太平峪虽与东陵相据较远，但与北京相据并不遥远。据此，雍正决定在易县太平峪为自己建造陵寝。从雍正八年开始营建，历经八年于乾隆二年完工，命名为泰山陵，简称泰陵。雍正因此成为葬在清西陵中的第一位清代帝王，后来嘉庆、道光、光绪三位帝王相继葬于此地。西陵由此成为清代三大皇家陵墓之一。高其倬也因为雍正择陵址之功，被恩授三等男爵世职。

高其倬祖籍山东高密，出生于显赫的官僚世家，祖父高尚义，官至协领，以军功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父高荫爵，官至直隶口北道。高其倬为其父次子，自幼聪慧好学，又喜好堪舆之术，康熙三十三年，年仅18岁的高其倬中进士，不久娶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孙女为妻，与后来成为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俱为清代著名词人纳兰容若的女婿。高其倬博学多才，清朝才子袁枚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里说：“公于学靡不窥，天文地理皆洞悉，而诗尤工”。高其倬曾为唐代风水大师杨筠松所著的《撼龙经》、《疑龙经》做批注，著有诗集《味和堂集》。

■　海岱一方

野猪林今安在

□　宋庆祥　李连民　刘黎辉

野猪林到底在现在的什么地方？

电视连续剧《水浒》的热播，引起人们对水浒文化的极大关注。9月23日，水浒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莘县举行，对野猪林、十字坡的遗址进行了研讨。有学者指出，《水浒传》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写道：“只说董超、薛霸将金子分受入己，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来使臣房里取了林冲，监押上路。当日出得城来，离城三十多里路歇了。”“第二日天明，起来打火，吃了饮食，投沧州路上来。时遇六月天气，炎暑正热，林冲初吃棒时，倒也无事。次后三两日间，天道盛热，棒疮却发，又是个新吃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动。”如此算来，第一天董超、薛霸因将金子送回家，耽搁了些时日，只行得三十多里，后三天走得多些，就算五十里，总共一百八十里左右，可见这野猪林就在河南开封东北方向一百多里的地方。为什么是东北？因为沧州在开封东北方向。

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了林冲，“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里敢扭他？好便骂，不好便打。两个公人不敢高声，只怕和尚发作。行了两程，讨了一辆车子，林冲上车将息，三个跟着车子行着。”护送了“十七八日，近沧州只有七十来里路程”，前文说的明白，东京“去沧州二千里有余”，林冲一共走了二十二天左右，约合每日百里，可是这后十七八天，林冲是坐车行路，在鲁智深“好便骂，不好便打”的监押之下，董超、薛霸这俩倒霉蛋还不尽心尽力推车？因而走得快些，也在情理之中。所以说野猪林离开封不到二百里。

莘县政协原副主席杨巨源认为，书中提到的野猪林正处在从东京至沧州的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官道——汴沧道上，从开封押解林冲去沧州，野猪林乃必经之路。而野猪林之遗址，就在现在的莘县观城东不远处，明代《正德观城县志》中就明确地记载着“野猪林”这一地名。

杨巨源介绍，当地人口口相传，古时的观城一带虽然没有悬崖峭壁的石山，却遍布土岗起伏的丘陵，各类树木生长得特别旺盛，林中常见野猪出没，人们便将此林称为“野猪林”。后来有猎户为狩猎方便，在林中造屋居住，繁衍成村，人们遂习称其为“野猪林村”，林名从此变为村名，并被记入县志。至清代，野猪林一带仍然人烟稀少，十分荒凉。新中国建立前后，野猪林仍有相当规模，远远望去，一片林莽，密不透风，边际难寻。与书中：“枯曼层层如雨脚，乔枝郁郁似云头，不知天日何年照，惟有冤魂不断愁”的描写十分吻合。后来，随着野猪林的消失，林中猎户回归各自的老村，野猪林村已不复存在，其遗址当在今莘县观城镇郭海村北一带。

根据地理考察，从开封到济南官道驿站没有大范围的参天林地，只有济南黄河北岸的黄花铺以北至德州有方圆百里的森林区，当地数代百姓称之为野猪林，所以《水浒》中的野猪林当位于此地。据当地百岁老人讲，早些年间，当地百姓不愿说家住野猪林，怕外界把他们和荒凉野蛮联系在一起，只是因《水浒》的热播，人们才说出家住野猪林附近的事实。

有专家指出，1996年上海同济大学自然环境考察组，根据林冲行走的路线速度以及当时官道驿站和野猪林的距离和位置，最后断定当年野猪林的位置就在现今王杲铺镇东北方向七八华里的甜水铺以东，胡庄、杨黑、杨文一带。古官道如今印迹犹存，深半米多，宽4米多，古老的酸枣树仍有很多，根如古龙盘旋暴露在土外，离古官道纵深五六华里就是林冲当年遇害的地方，高高的土岗还在，直径1.5米以上的古树墩还有很多，这就是野猪林的中心地段。

还有的专家指出，古时德州一带称为东夷，黄河水流经此地入海，长年累月形成大面积冲积平原。由于黄土高原的水经黄河流到这里改善了水土气候环境，通过黄河水冲击过来的植物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逐步形成林地。林中逐渐聚集百兽，野猪尤其居多，此地形成野猪林也不无道理。

□　责任编辑　于岸青